

当代国家安全丛书

社会安全



DANGDAIGUOJIA

ANQUANCONGSHU

学术顾问 李际均 主编 尹希成

岳公正 尚珂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DANGDAIGUOJIAANQUANCONGSHU

社会安全

岳公正 尚珂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安全/岳公正,尚珂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0

(当代国家安全丛书/尹希成主编)

ISBN 7-5419-9642-4

I.社... II.①岳...②尚... III.治安—研究—中国 IV.D6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446 号

社会安全

著 者:岳公正 尚 珂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181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19-9642-4

定 价:18.00 元

序

○李际均

伴随着人类迈入全球化时代,也出现了一系列关乎国家安全危机的问题,诸如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这些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研究这些安全问题的实质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意义,提高全民族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保卫国家安全、消除安全隐患的途径和措施,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探讨,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学术系统工程。为适应上述需要,由尹希成教授担任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支持,有关方面专家合力撰写了《当代国家安全》丛书。这套丛书为我国在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原则,互补不是替代,让度必须对等,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必须明确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和目标之所在,不畏惧任何侵略威胁,不为扑朔迷离、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所迷惑,不被外部战略动作和某些思想理论所误导,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应对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的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国家综合安全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也没有前方、后方界限,需要动员综合

国力,建立包括危机预警、反应、评估、管理、保障在内的指挥控制与协调机制,并由国家立法,形成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各要素的规范化。

一、以国防为主导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未来 20 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并不等于是国家安全的机遇期。这段时期同样是超级大国试图独霸世界、遏制出现能与之抗衡的大国的机遇期。时间是重合的,目标却是不同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发展,它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威胁别国;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面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内部分裂势力突破底线的图谋,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中国必须具有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国防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必然回应。传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军事入侵和政治颠覆。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持社会稳定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中国国防安全的主要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由于长期遭受侵略而造成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至今海洋权益仍不断受到蚕食的国家。这种现实和被侵略的历史记忆,使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加强国防怀有强烈的要求和期望。

西方理论界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带有国家功利和西方中心的色彩。“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非安全化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主张: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按照中国学者的诠释,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理论,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化设计,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

式的呼唤。但它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没有一点约束力。建构主义理论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2004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消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免遭受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的发展也会化为乌有。据有关资料统计,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第一,但20年后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8倍,但4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之后又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被迫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知,就是从先人的血泪中得到的。

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主权的存在,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多年来中国走的的就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越是发展越需要国防的保障。诸如重要城市、经济区域、交通枢纽、大型水利电力工程设施、核电厂等战略经济要地(要点)的安全,在国防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民解放军是国防安全的主体,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抓紧完成向机械化、信息化的转变,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战略制衡力量,尤其是发展海、空军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随时做好应战准备,刻不容缓。它是确保我国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参与维护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国际新秩序,和在国际军事交往与对抗中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实力依托和决定性条件。

由超级大国主导的新军事革命,并没有使自身更安全,却使世界更不安全了。技术先进的国家在完成了一场军事革命,军事技术带动整个军事领域发生质变,从而使军事力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之后,是其与技术落后国家军事力量差距最大的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大国先后完成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进行机械化战争,并掌握了核武器。那时我军装备仍处于手工业和准工业时代的水平,与军事技术先进国家相比是差距最大的时期。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大国的军事技术处于稳定和渐进期。中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急起直追,某些常规武器性能相差已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尖端武器方面,我们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弹道导弹、核潜艇,具有战略上等效威慑的手段。这是我国在军事技术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最小的时期。80年代以后,超级大国又开始了以信息战加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新军事革命,军事技术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开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可以预见,今后10~20年是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军事变革、力求缩小差距的时期,也是遭受侵略威胁风险较大的时期。

毫无疑问,进行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在决定胜负因素中的比重增大了,对此,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发展自己的“撒手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并非不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敌我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困难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有人这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战士;中国今天能这样屹立,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战场殊死而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改变了中国的位置,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面孔,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在高技术战争中,我们仍然要发扬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那种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作战上,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掌握战场主动权,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方进行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在能发挥我军优势的地方创造战机。正视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应当的;迷信和夸大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却不必要。信息化战争无论怎样发展也达不到

有人说的“制大脑权”的程度。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更是难以实现的,它反映优势中的脆弱性,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伊拉克战争表明,国防武器的作用不能低估,但国防意志的力量更为重要。

二、以经济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西方大国资本化的崛起,大都有发动战争掠夺和剥削殖民地的历史印记。例如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强索 2.3 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中国清政府 3 年的财政收入。日本靠这笔不义之财发展了工业、军备和教育事业。当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制定和调整军事战略时,都有浓重的经济背景,凡是重要资源产地都是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焦点,侵略、干涉披上人权、民主的外衣,经济跟随军事的“徐进弹幕”推进。从前苏联解体后的几场战争中,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战争发动者的全球战略部署和石油利益的考虑。安南呼吁:要“阻止国际安全体系重新滑向基于‘弱肉强食’原则的野蛮竞争”,这是很有见地的警告。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社会健康前进的道路,但也是艰辛而曲折的道路。这就是面对既定的西方资本主义规则,在没有主导资源、市场定价权力和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就是实现国际间共同受惠、共同发展、平等互利的全球化,而不是贫富悬殊、发达大国有单方制裁权的全球化。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力量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自由主义利用这个口号,作为推行经济霸权的工具,然后又扩展到军事、政治、文化、舆论等各个层面。发达国家在上述领域的实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而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and 绝对优势,正如著名思想家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指出的,“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以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基辛格博士更直截了当地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最为严重”,“全球化实质上意味着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

所谓采纳美国的模式,并不是与美国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与繁荣,而是利益流向美国、代价留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方式。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又进一步成为美国干涉他国主权的借口。

上世纪末期,美国迫使拉丁美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实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消除政府干预,这种不计社会成本、牺牲社会公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广大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造成社会不稳,落入经济殖民化的陷阱。俄罗斯经济改革也有类似的教训,例如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被外国控制,大量资金外逃,国有企业资产被严重低估后卖给私人,仅用四年时间就把2/3的国民财富转移到私人手里。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一些中亚国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结果又成为西方在那里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其政权的理由。当年曾写过30本书,批判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著名哲学家、作家季诺维也夫在目睹前苏联解体后的现状说:“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永远不会写这些书”,“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这位哲学家发出的慨叹,是很值得让人深思的。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政治和军事的扩张。和平演变与非和平演变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本来在苏东剧变后,东欧和中亚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倾向西方的,但美国仍嫌不够,于是支持反对派推翻合法政权,建立更加亲美的政权。“颜色革命”向东蔓延,进一步改变了中亚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不但是对世界稳定的破坏,也对各邻国主权构成更为现实的威胁。全球化决不意味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淡化,否则全球化就是陷阱。值得警惕的是,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极力宣扬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企图误导我国经济改革。有些国有企业的改制,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和对国有资产的掠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抽掉了社会公正的内容,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国家的核心力量不可侵犯,这不但包括国家的支柱企业和战略企业,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又是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当然也就成为国

家安全的重点,具有相应的战略地位。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实现和确保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和科技等安全的物质前提。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应具有完整指导思想和缜密方案的整体战略。从经济战略态势上讲,同西方大国打交道,在总体上中国处于弱势。以弱对强的较量,首先要讲战略防御。经济上的战略防御,一是对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活动的调控,制定某些有根据的限制性措施,保护本国有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国防科技、远程通信、知识产权和交通网等。二是增强国民经济体系中薄弱环节的抗外部打击能力。三是要有对付经济制裁的战略预置。四是造成犬牙交错的经济战场,在相互利益的牵制中求得安全保障。

在做好经济上自我保护的基础上,扩展经济安全的边界,面向全球主动出击,进军国际市场,开发国外资源,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获取重要战略资源市场的相应定价权力。中国 2003 年是世界钢材第一消费大国,石油第二消费大国,但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中连 0.1% 的权重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中国拥有广大的需求市场,拥有一定的资源,拥有充足而优质的劳动力,具备在世界经济战场上—争高下的条件,需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和改造,按照“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

更广泛意义的经济安全还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基因安全,以及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经济制裁等等。非传统安全的各个领域的划分并不是很严格的,有相互交叉、包容的情况。例如科技与信息安全既是其自身领域的安全,又是其他所有安全领域的支撑和保障,而这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出版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就写道: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在出口给中国、俄罗斯、伊朗的电脑和技术装备中预置可用遥控激活的病毒。对这本书内容的真实性我们没有考证,但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不久前美国《华盛顿邮报》登载署名文章,披露 20 年前中央情报局把预置破坏程序的软件售给前苏联,导致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对当时前苏联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这对我国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警示。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经济部门 70% 的信息安全设备来自国外,特别是我国信息系统网络设备使用的关键芯片与核心软件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信息被控制,则所有安全都将受到威胁而受制于人。又如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项新内容,它比环境保护高一个层次,不仅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支持,而且关乎民族生存的长远问题,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粮食安全对于我们这个有 13 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稳定具有特殊战略意义,“三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

中国作为石油纯进口国,石油直接关系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是中国国防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其中 4/5 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这条运输线是被外国控制着。中国南海石油资源被大量侵占。伊拉克战争后,中亚——里海能源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西部陆上石油之路,已受到不利影响。东部石油进口管道计划受到国际恶性竞争的干扰。为了避免被人从源头和运输通道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稳定供应,中国迫切需要制定石油能源发展战略,统筹石油的节约、开发、储备、进口、替代和运输线的保护等,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三、文化安全是保持国家安全的精神阵地

在全球化时代,涉及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领域,都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其中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保卫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锻造出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热爱和平、不畏强权、坚韧不拔的灵魂。一个失去意志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安全和尊重的。确保国家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受侵犯,培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巩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 1992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兴衰。文化融合与文化差异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每个

民族都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的继承者,它一方面顽强地守望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接受和补充本身缺失的东西。中国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就是这样。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创造性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既要学习别国先进文化,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既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提纯,摒弃其中的因循守旧、缺乏创造性和“重道轻器”的消极成分。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传媒都成为强势文化扩展的手段。这种“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正如汉密·J·摩根索的著作中说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理查德·克罗斯曼为英国作家桑德斯所著《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写的序言中说:“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场战争具有一个庞大的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1989 年 5 月,美国一份官方文件说,美国要用 20~30 年时间“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从而建立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这种文化战略,在促使前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得到成功的运用。前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的原因,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运用传媒的渗透,对前苏联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联盟的“倒米”浪潮更是西方国家直接策动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府对外资助机构”通过商业合同交给塞尔维亚反对派大量经费。在南联盟总统选举时,美国资助反对派的重达 80 吨的 250 万张标语张贴大街小巷,每一个投票站的监督员都领到西方提供的“好处费”。米洛舍维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攻势下,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接着又被出卖给海牙法庭。可见“天鹅绒革命”的厉害。俄罗斯专家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中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精神潜力被最大限度地削弱,失去国际信誉,而国内人民也不准备奋起保卫祖国时,对这个国家的军事侵略就会成为可能。”这个评论是很切中要害的。

按照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文化市场的分销领域将逐步放开,文

化市场的激烈争夺战也将随之展开。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的冲击会汹涌而至。跨国公司母国文化在中国也会不断扩大阵地。俄罗斯学者指出,卫星电视是强国争霸的工具,“卫星电视如同核武器一样,正成为强国的标志,并将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在外国强大的文化攻势下,国内部分人群会滋长文化自卑和“崇洋”心态。敌对势力还会利用民族和宗教进行分裂活动,搞“松土工程”。特别是台湾地区分裂势力推行腐蚀中华民族认同基础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都是我们面临的一场严峻斗争。

有中华民族的灵魂,才有文化艺术的灵魂。有多元就需要有主脊。一个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过程中,首先要有精神的复兴。用先进文化引导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或缓的任务。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赖于几千年来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尊、自强、自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品格,以及勤劳、善良、热爱和平、宏大宽容的道德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年代激发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确立了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和民风的主流基调,也树立了泱泱大国的文化形象。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发展已经展现出带动与配合亚洲甚至世界发展的良好趋势,正如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载文说的,中国“巨龙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国际社会迟早会认同:“中国威胁论”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贡献论”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2005年12月

序

○尹希成

《当代国家安全》丛书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丛书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即将问世,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回想起来,我涉足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段科学探索的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先后主持了“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等课题的研究。研究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只有靠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一系列全球问题面前,人类有了共同的利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能越来越多。但是后来,由于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兴起和个别大国的霸权主义越演越烈,我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虽然有了共同利益,但在以主权国家为政治单元的当今世界里,国家利益仍是任何主权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根据和出发点。我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水平上是不全面、不彻底的。为了把这项研究进行到底,我转而关注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国家安全。这就是我策划这套以研究国家安全为宗旨的丛书的初衷。

在研究国家安全时我发现,当代国家安全概念不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的,或者说传统的国家安全仅限于防止外敌入侵的军事威胁,即用军事手段捍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客体,即需要保护的對象和領域随着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不断增多和细化,已从政治和军事的传统安全领域扩大到经

济、文化、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和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不言而喻,我们这里研究的国家安全是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起来的综合安全。综合安全观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在霸权主义肆虐的今天,军事安全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也再不能把一些非传统安全排除在国家安全领域之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常用“天灾人祸”来描述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和呼唤人类的忧患意识,其实这精辟的四个字就包括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猖獗一时的“非典”,2004年岁末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可以说都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战争。

冷战结束后,我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安全问题凸显,如何从战略高度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我们每个关心国家未来和命运的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安全研究不是少数智囊和精英的专利,应在政界、学界和民间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以达成共识,最终形成指导我们国家安全建设的政策和战略。应该说,我们撰写的这套丛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在这里我受丛书作者的委托,郑重说明,各位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思想和观点只是作者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一孔之见,如有不妥之处处理应文责自负。我们深知,我们的研究是粗浅的,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如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两难选择,国家安全战略的科学表述,制定评估国家安全的指标体系,建立国家安全预警和决策的机制等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最后,我借此机会对我多年来从事客座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我还要感谢多年来同我合作的研究集体的各位同志,他们都是我的学术知音和益友,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无法完成从人类共同利益到国家利益,从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到国家安全这样大跨度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2006年元旦于北京

前言

群居、围墙与权威，这是从猿到人的过程，也是国家与法律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自然历史进程中，公民对国家的第一需要是安全。国家合理有序的前提条件之一，即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

人们已在体会和理解“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冲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安全的成本在上升，因为危险来自各方面，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只是提出社会稳定目标，而不是对引起各类社会安全问题的危险源进行研究，所要解决的社会安全目标将建立在沙滩上，难免出现发展观的失衡和公共选择失误。

如今，社会生活中的危险源是多方面的，如健康无保障，产品不合格，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社会治安秩序差，医疗服务质量低，失业增加等。因此，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探讨了一个覆盖上述各类危险源的综合概念，即社会安全。社会安全的政策目标是为市场、企业以及公民个人创造安全生存的环境。公民对国家的第一需要即安全保障，所以，政府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即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从安全保障范围来看，涵盖了健康安全、就业安全、社会保障、消费安全、社会治安等。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安全需要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来支持，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动作，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避免政府失灵，特别是要避免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往往表现为公共政策选择失误和公共计划执行不力。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要想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就必须以人为中心，

依靠社会公众、社会团体或组织以及政府的力量。只有掌握了现代社会安全观,从全新的角度看待社会安全领域的诸多问题,才能积极调动上述力量,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危害社会安全的诱因。

社会安全总体框架的制度安排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过程和信息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扩散迅速的不确定性。全球化不但可能带来技术发展的风险和环境的损害,还可能引起金融与投资、知识与生活状况的裂变,此外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了突发的频率。因此,全球化所催生的“高风险”的社会,必然要求建立能够有效控制社会风险的社会安全框架。全球化会像火车头一样,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各个群体,致力于建设社会安全体系。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社会安全问题。基于对社会安全一般理论的分析和对社会安全体系的创新性论述,深入探讨了中国的社会安全形势及其治理对策。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因为目前国内理论界尚未提出构建中国社会安全体系的命题,已有的一些相关研究都是局部性的、零散的,甚至还未对社会安全体系的概念进行界定。显然,本书构建的中国社会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政策借鉴意义。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对社会安全的基本概念加以界定和深入分析。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安全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社会安全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社会安全、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社会安全对于中国的意义,即社会安全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社会安全的冲击和挑战,对社会安全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社会安全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如何。围绕着以上社会安全问题,本书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与论述。

其次,构建了一个中国社会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该部分总体上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安全框架中,针对公民安全和健康安